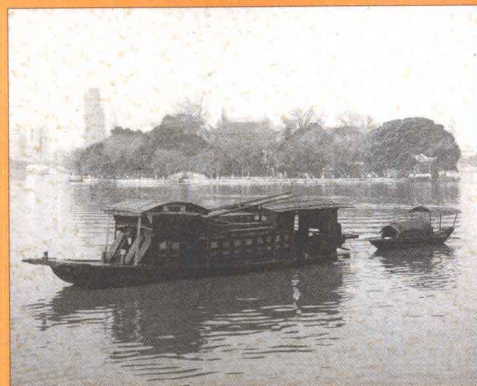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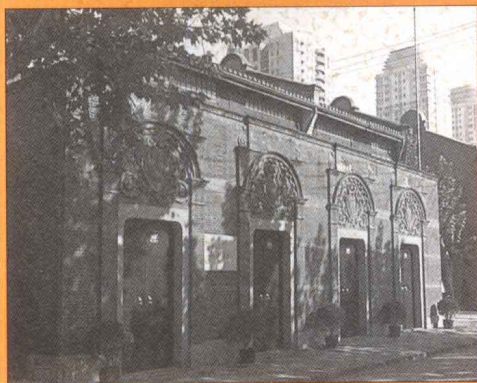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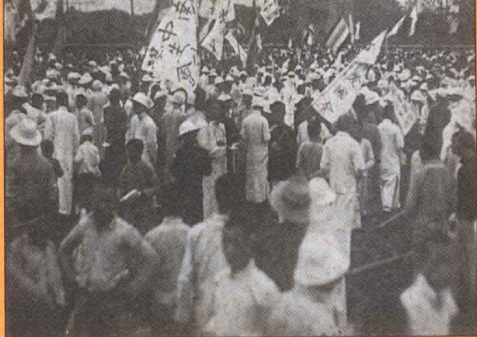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 1921 年的中国诞生?历史真相的复杂和历史细节的模糊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这里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是作者遍访海内外知情人、档案馆、权威学者,积十年之功、呕心沥血完成的巨作。他用纪录片人的敏锐观察和宽阔视野,历史学者细致入微的考证和缜密清晰的思辨,生动而富有激情的文字及 600 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展示了 90 年前建党大业的宏伟图景……

# 开端

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

〔下〕

张军锋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开端

## 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

张军锋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下〕

## 第八章 播火羊城

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唐宋时期对外贸易就居全国之冠，即便在清朝海禁时期这里仍然是朝廷指定的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广州又是著名的侨乡，广州裔华侨分布在世界五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正是因为这里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联，近代以来，这里最早领受鸦片战争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最早被迫对外开放和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同时也最早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出现一批又一批企图引进西方文明以改造中国的“先进的中国人”。从林则徐虎门销烟、洪秀全酝酿起义，到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广州一次次成为近代中国的焦点地区，并最终孕育出封建帝制的掘墓人、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

孙中山不仅在广州接受教育，而且在广州“放言革命”，结交志士，从事革命斗争，尤以辛亥黄花岗之役影响最大，它吹响了武昌起义的前奏曲，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又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在南粤大地上掀动了一浪高似一浪的大革命风潮。

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这风暴的中心汇入这大潮之中迅速壮大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执牛耳者。

那么，马克思主义之火最初是如何在羊城广州点燃起来的呢？

## 1. 北京大学的三个广东人

要了解广州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不能不从北京大学的三个广东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说起。这三人中,谭平山和陈公博后来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不过一个是青史留名,一个是千古罪人。陈公博是继汪精卫之后的第二号大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公审,1946年在苏州被执行枪决;谭平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

1917年夏天,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三个人中,谭植棠是谭平山的同族侄子,21岁,年龄最小;谭平山31岁,年龄最大经历也最丰富;陈公博26岁,也有着不凡的经历。这三位广州同乡虽然年龄、性格差异很大,但因为都很注重乡情,且志同道合,因此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

谭平山1886年出身于广东高明县的一个裁缝家庭,读书时曾用谭鸣谦、谭聘三等名。幼年先后在家乡读私塾和新式书院、中学学习,受过严格的教育和训练。22岁时考入广州两广优级师范学校读书,来到广州,走出了“守成创业,振兴家声”的狭小天地,从此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秘密反清的宣传活动。1910年,谭平山从两广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到前身是雷阳书院的广东雷州中学任数学教员。辛亥革命后,谭平山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代议士(议员),参加广东省临时议会活动,并升任为雷州中学校长。1913年,谭平山以同盟会会员身份转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较早的党员之一。

对于雄心勃勃追求大事业、大成就的谭平山来说,他自然不愿意在地方偏僻、文化落后的雷州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1916年,谭平山毅然辞去雷州中学校长的职务寻找新的出路,在第二年考入北京大学,来到新文化运动的风暴中心,并在这里崭露头角。



在北大读书期间的谭平山

1918年秋,谭平山参与发起北大著名的新潮社,在《新潮》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哲学对于科学宗教之关系论》,得到蔡元培的高度评价。随后,他又在《新潮》上接连发表了《法理与伦理之本质区分论》、《“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劳动问题之解决》、《现代民治主义之精神》等多篇论著,在这些文章中,谭平山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极大热情,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认识。随着《新潮》杂志的影响不断扩大,谭平山的名字和论文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谭平山还参与了在北京大学具有广泛影响的新闻研究会的改组,接触、结识了毛泽东等各式各样的

人物,为其后来从事革命活动开阔了视野、奠定了基础。

在五四运动中,谭平山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在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斗争中表现英勇,被北京军警逮捕关押。经过这场斗争的洗礼,谭平山的思想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于该年12月在《新潮》发表《现代民治主义之精神》,标志着他已经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与谭平山在北京大学的异常活跃相比,小五岁的陈公博在北京大学的三年中却显得“静若处子”,他一直安心读书,对轰轰烈烈的学潮和团体冷眼旁观,因为他早已经历过了“革命”和挫折,只想遵父命扎实读书,增加学识。

陈公博出生于广州大北门内长泰里一所颇为显赫的宅第,他的父亲陈志美行武出身,曾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最后官至广西提督,人们尊称他为“陈军门”。陈公博是这位陈军门花甲之年的独子,从小聪颖异常,也非常淘气。受父亲熏陶,陈公博自幼习练武术骑射,身强力壮,这对他日后形成勇武好斗的性格有一定影响。

陈公博6岁的时候,父亲从广西解职,退居广州家中赋闲,但官级不改,俸禄依旧,家道殷实。陈志美虽位居清朝高官,却在早年从军时就加入过秘密会党“三合会”,隐藏有“反清复汉”的思想,广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接触,走上了毁家举义、背叛清廷的道路。1903年他与广州革命党人密谋起义失败。1906年,陈志美受命承担北江地区起义的军事指挥责任,因计划不周再次失败。15岁的陈公博参与了这次举事,跟随父亲远涉韶关乳源,增长了许多见识。

这次举事失败后,陈志美被押入广州死牢。陈志美的人狱,彻底改变了陈公博的生活道路,他由富家阔少一变而为死囚家属。陈家的财产已在准备革命的过程中消耗殆尽,陈公博饱尝了生活的艰难。

辛亥革命胜利广东光复后,作为反清革命功臣的陈志美堂而皇之地出了狱,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兼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顾问。陈公博虽然还不到20岁,但已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所以乳源县成立县议会时,他被选为议员。乳源县议会议长说自己年事已高,不适合当议长,陈公博年轻且才华横溢,想把议长让给他。正在这时,广东民军司令部招兵买马,正缺一个参谋,民军司令看中了陈公博,想把他招到麾下。年轻气盛的陈公博以革命党功臣自居,大有拔剑击柱、登台一展宏愿之意。

但陈志美对于陈公博的未来却另有考虑,他将在民军司令部里活动的陈公博找回家中,痛骂一顿:你有多大年纪?有多少学问?要当议长,当参谋。你如果要做事,先去当大兵。民国安定以后,再去读书求学。否则,这议长和参谋根本害了你一世。陈公博



青年时期的陈公博

听从父亲的劝告,辞去议长和参谋的职务,参加了广州北伐学生军。南北议和后,学生军解散,陈公博谨遵父命,弃武从文。

1912年,陈志美以80高龄去世。陈公博于1914年考入广州政法专门学校读书,1917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永远忘不了父亲对自己的那次责骂,暗暗地告诫自己,不管闲事,专心读书,决然忘却自己造反革命的历史,从头做起。他在北大学习的三年可以说是养心性、寡交游,“所来而不大往的都是同班或同住的同学”,关系最亲密的要算是谭平山和其族侄谭植棠了。他和谭平山同住一个宿舍,二人上课时也常坐在一起。陈公博对他和谭平山在北大时的情景有过这样有趣的回忆:

平山的原名叫谭鸣谦,别号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庐的意思,后来他改名平三,也是由聘三谐音来的。那时我因为他留了一撮小胡子,免不了开玩笑的叫一声聘老。迹时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别号聘卿,就是世间所传的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一,声势煊赫,报纸常书聘老而不名。我也唤平山做聘老而不名,并且时常对他说笑,谓南北两聘老遥遥相对。而平山为了报复罢,唤我做猛野,广东人叫厉害是猛,而野呢广东是家伙的意思,所谓猛野,就是利(厉)害的家伙。这样彼此称呼,差不多好几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汉口重遇平山,还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为人,年纪比我大几岁,世故也比我老练多,只是他具有一种名士风,充满浪漫气息,不大修边幅,在北京某一时期,也曾发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时机和兴趣一过,又依然浪漫不羁。后来在广州替共党工作,倒是一个努力不懈的人物。<sup>①</sup>

谭植棠的一生没有谭平山和陈公博那样有声有色,但勤勤恳恳,参与广州共产党的创建,负责组织工作。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粤区委员、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四届主

任、中共广东区委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统一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主席。1926年后长期患病,和党失去联系。1944年冬,经党组织审查,恢复党籍,后受党委派,赴港澳从事统战工作,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建国后,任广东西江专署工商科长、西江贸易土产公司经理、西江粮食公司经理。1953年病逝。

关于谭植棠在北京大学期间的情況,没有太多的资料。只有陈公博一段简短的回忆,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年谭植棠

<sup>①</sup> 《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4—415页。

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sup>①</sup>

在“五四”大潮的冲击下,陈公博再也无法平静如初,开始迸发出年轻人参与社会的强烈欲望。如果说辛亥前后,陈公博只有革命经历,尚未有革命主张的话,“五四”以后,他开始对于民族、社会、主义等问题有了自己的见解。

1920年初,陈公博和谭平山、谭植棠三位好友即将从北京大学毕业,在一起商议毕业以后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谭平山总结了他在北京大学期间办《新潮》的经验,提议办一个刊物,通过研究和宣传,推动社会的改革,陈公博和谭植棠都很赞同。

1920年3月1日,他们在上海创办了《政衡》杂志。该刊的宗旨是:政治——主根本革新,社会——主根本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解决。

在目前所能看到的《政衡》第一号、第二号两期目录中,陈公博的文章就有七篇:《中国之未来革命》、《南北议和与国民的自觉》、《制度与思想》、《中日亲善上的不相容》、《我们怎样去组织市政府》、《我们为什么还谈政治?》、《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从这些文章的题目中我们不难窥视出一位年轻学者的思想轨迹,他不但以一个民主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对中国的政治问题发表见解,而且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和研究。

谭平山在《政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已经一改《新潮》时期那种纯学理研究性的风格,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针对性。他在《世界军阀的末日》中指出军阀必然灭亡的四大原因,在《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政党组织失败

的原因和世界各国政党的最新潮流,提出借鉴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组织政党的种种设想。

与此同时,他们还密切关注广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展,通过向广州的朋友寄送《新青年》、《新潮》、《政衡》等报刊保持经常联系。

广东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和接受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一个省份。在五四运动以前,广东已有许多青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先后到北京、上海以至日本、欧洲等地求学。《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政衡》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



《政衡》杂志

<sup>①</sup> 《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4—415页。

刊传到广州的同时,本地也出版了《中华新报》、《粤报》、《羊城报》、《国民报》、《大同报》、《岭海报》等多种新书刊,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主义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种社团组织纷纷发表言论、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6月10日,广州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生首先罢课,12、13、14日各校相继罢课。在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联合社会各阶层,以抵制日货为中心,把运动推向纵深发展。在南粤大地上涌现出杨匏安、阮啸仙、彭湃、刘尔崧、周其鉴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但是,自从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护法政府大元帅职务之后,广州就一直在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把持中,成为封建军阀割据的天下。一度欣欣向荣的革命发源地,政治气候变得十分沉闷,新文化思潮的宣传远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

谭平山和陈公博、谭植棠三人商议,要在广州办一份报纸,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

## 2. 成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广东群报》

1920年夏天,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从北京大学毕业,经上海回到广州,分别到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公立法政学校、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任教。这三所学校是广州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大力开展各种活动的主要地点,他们的加入使广州先进知识分子的力量进一步扩大了。

从上海回到广州不久,谭平山、陈公博便接到陈独秀的来信,认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不能落后,要他们在广州组织建立共产主义组织。8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陈公博对青年团成立的过程有这样的回忆:

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声势很是浩大,参加分子有各学校的教授,也有各学校的学生,原因是我和平山在高师和法专当教授,所以参加者非常踊跃。老实说,参加的人员绝不是对社会主义有研究,而是好新和好奇。其时国民党人也有研究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既多,声势殊震。<sup>①</sup>

青年团成立之后,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队伍中进行活动,发展成员。虽然参加者非常踊跃,但由于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青年团组织的成分和团

<sup>①</sup>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节录),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77页。

员的思想状况是相当复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严密的组织纲领和具体的发展计划,也没有标明信仰何种主义。

尽管如此,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还是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以后有不少成员如林祖涵、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等都是由此而发展为共产党员的,这便为广州共产党的建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促使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提上日程。

陈公博和谭平山在教书、在工会开会、到各地演讲的同时,开始着手实施他们创办报纸的计划。陈公博回忆说:

当日办报纸的动机,并不在于营利,我于报业是有经验的,尤其在广州办报纸只有亏本。我们的动机也不在于自我宣传,那时我们刚在学校毕业,只想本其所学,在学校教书,根本并没有政治欲。我们的动机的确在于介绍新文化……但甚么才是文化,我们当日也没有抉择,只是介绍各种未曾输入广东的学说,这种思想大约是受了蔡子民先生的影响罢,但当时群报的确是这种姿态。

报纸的名称定为《广东群报》,意思是发展人类群性,建立群众团体,团结互助,创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要办报,首先要募集资金。他们准备在同学、朋友中集资3000元,结果募集的结果不足半数。谭平山和陈公博把薪金与平日节衣缩食剩下的钱全部拿了出来,好不容易凑齐。报社的地址选在广州市第十甫第100号。根据经验,推陈公博作总编辑,谭平山编新闻,谭植棠编副刊。

在筹办《广东群报》的过程中,谭平山曾写信给陈独秀,征询陈独秀的意见,希望得到他的指导。陈独秀回信表示:

广东、广州是我国重要省、市,在历史上是革命策源地,曾多次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今,更成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欣闻《广东群报》即将问世时,仅以极大热情表示支持,来信恭贺,并望能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精神,肩任开发民智重任,扫除旧社会一切陈规陋习俗,决不能随波逐流,做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资本家之应声虫。<sup>①</sup>

1920年10月20日,《广东群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终于出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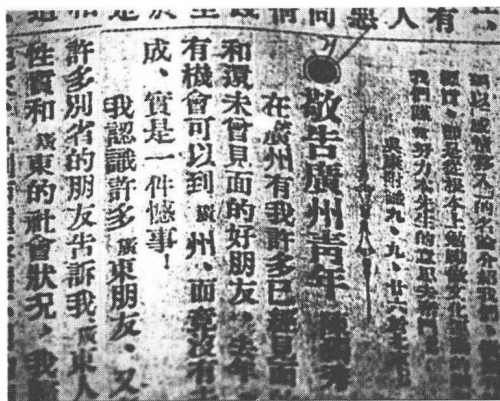
在创刊号上刊登的《筹办群报缘起》开门见山地申明报纸的宗旨是:(一)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二)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

《筹办群报缘起》一文还表明报纸的目的和责任:我们群报的目的,就是主张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事情,虽然很多。而我们认定新文化运动,是今日改造社会一种很重大很切要的事情。又新文化运动的方法,虽然不是办日报就可了事,但不能不先有日报做宣传的机关,所以我们群报对于社会,就是担负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那个责任。

<sup>①</sup> 转引自蔡德金《汪伪第二号人物陈公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广东群报》创刊号



陈独秀的《敬告广州青年》

创刊号在醒目位置刊登了陈独秀热情洋溢的文章《敬告广州青年》：

在广州有我许多已经见面的和还未曾见面的好朋友，去年很有机会可以到广州，而竟没有去成，实是一件憾事！

我认识许多广东朋友，又有许多别省的朋友告诉我，广东人的性质和广东的社会状况，我归纳起来，得到两种极端不同的结论。一是好到无以复加，一是坏到无所不至。这两种结论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极端矛盾，不能并存，然而我以为这两样都是事实。

在民族性质说起来，不能为大恶的必不能为大善。所以富于保守性的康有为是广东人，富于革命性的孙中山也是广东人，富于物质主义商买性质（广东人赌钱做官的乡绅是同将本求利的物质主义）的梁士诒是广东人，富于理想主义的刘师复也是广东人。在社会阶级上说起来坏到无所不至的，恐怕就是有产的绅士，好到无以复加的，一定就是无产的劳动者及学生。因此别人对于广东两种极端不同的批评，我以为都是事实。

现在压迫湖南底暴力去了，湖南青年底奋发一日千里。我料压迫广东人底暴力不久也要去，我希望广东青年万万不可错过了机会。

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垮的古典文字。

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或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

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

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

我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sup>①</sup>

创刊号还发表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文章，并在刊登于《新青年》的广告词中宣称自

<sup>①</sup> 陈独秀：《敬告广州青年》，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21页。

已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面的一线曙光”。

《广东群报》初创时,曾热衷于宣传“群性”之说,认为“群性”即互助互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主张“发展群的本能,划除群的障碍,巩固群的壁垒,增进群的乐利”。

《广东群报》还开辟《工人消息》、《时评》等专栏,发表了《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列宁传》等文章,在广东地区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启蒙宣传。

## 相关链接 27——杨匏安:广东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在广东,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杨匏安。

杨匏安(1896—1931),又名锦焘,笔名匏庵,广东香山。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大量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1916年回国,先后在澳门、广州任教,1918年初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从1919年5月开始,接连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开设《青年心理讲话》等专栏,引导青年学生在爱国运动中健康成长。同年7月12日起,又新设《世界学说》专栏,连续发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40多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摩莱里、巴贝夫的“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集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西方各种流派的社会学说。



杨匏安

杨匏安在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连续刊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比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只差三个月的时间,因此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一。他在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给予无比热情的赞扬:

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上及实际上皆顿失去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之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也。

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塞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

## 3. “共和将军”陈炯明与苏俄和陈独秀的最早接触

就在谭平山、陈公博等回到广州不久后的1920年8月11日,桂系把持的广州军政

府以讨伐福州北军的名义,下令进袭孙中山领导下的陈炯明部,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陈炯明率粤军在各地军民的支持下,一路势如破竹,于10月28日赶走了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自上海返回广州,宣布重组护法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作为孙中山部属的陈炯明,不久即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军政府内务部长,执掌广东军政大权,成为广东实际上的最高当政者。

陈炯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广受争议的人物,争议的由来和他一生最大的转折发生在1922年6月16日。这一天,陈炯明的部队公然炮击广州越秀山上孙中山的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酷暑中在白鹅潭“永丰舰”上待了几十天,待援无望,只得转赴上海,史称“六一六兵变”。

“六一六兵变”后,国民党重要人物和国民党背景的报刊对陈炯明的评论众口一词,彻底否定,兵变后两个月就编成的《陈炯明叛国史》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在国民党正统史观和大部分人看来,陈炯明这个孙中山一手培养起来的总理信徒,居然背叛总理,“犯上作乱”,欲置孙中山于死地,使孙中山北伐统一中国的大业功败垂成,属于罪大恶极的“叛国者”,禽兽不如的乱臣贼子。中国共产党承认孙中山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奉孙中山为革命正统,把陈炯明作为祸国殃民的“总理叛徒”的形象固定化,使之成为历史定论。

但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为陈炯明鸣冤叫屈的声音就不绝如缕,90年代以来,随着《陈炯明与联省自治运动》、《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陈炯明集》(上下卷)、《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共和将军》等一系列论著的出现,这桩历史公案再一次成为华人史学界热议的话题。

陈寅生的《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基本肯定陈炯明的一生,称“其行谊气节丰度理想,真足彪炳人寰为世共仰”。康白石在《陈炯明传》中,认为陈炯明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重要的革命领袖之一,是一个爱国的民族主义者,是革命急剧转折点上的悲剧性人物。他对辛亥革命,以及在同军阀的斗争及政治改良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叶曙明在《共和将军》中称陈炯明是一位“曾统兵十万,驰骋疆场,威震闽南,名扬天下的一代人雄”,是临终时仍连呼“共和……共和”的共和将军。甚至还有学者把陈炯明和梁启超、陈独秀并列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陈炯明生前曾经亲拟了这幅追悼孙中山的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对陈炯明的评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学术问题。纵观其一生,的确大别于穷兵黩武的军阀政客,而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之付出了极大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史料浮出水面,不断充实的证据在日渐回归着陈炯明丰富的历史本真。<sup>①</sup>

<sup>①</sup> 关于陈炯明的评价问题参见段云章等编著《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

客观而论,陈炯明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容纳,“联省自治”的主张,兴教育、灭赌毒的举措都是史无前例的。他主政闽南和广东期间的开明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发展壮大客观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晚清秀才,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学员,同届同学中有邹鲁,教员中有朱执信、古应芬。1909年任广东谘议局议员,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参加广州新军起义联络工作,1911年3月参加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并参与攻打惠州的战役。广东军政府成立后,被推为副都督,不久后为代都督。1913年后参加二次革命和讨袁斗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参加了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组织的“晦鸣学会”和东方暗杀团,开始信奉主张世界大同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1918年8月,陈炯明参加护法运动,遵照孙中山的旨意,肩负“维护约法,再造共和”的使命,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率军进驻漳州,创建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

在孙中山的支持下,陈炯明在漳州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政治方面,陈炯明“强调还政于民,恢复宪法”,实行“共和政体”,提出了“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的口号,实行民主制度,整饬吏治;在文化事业方面,他创办了《闽星日报》,并附设《闽星》周刊;在社会事业方面,他大力开展城镇建设,修缮公园,筑路架桥。



粤军司令陈炯明

1919年初,陈炯明开辟漳州第一公园,园中立一高碑,敦请胡汉民、章太炎、孙中山、汪精卫分别题写“自由”、“平等”、“博爱”、“互助”镌刻于碑的四面,作为治理漳州的政治理念和信条。

一时间,漳州面貌焕然一新,俨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中心。1920年5月1日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刊文称漳州为“闽南的俄罗斯”,陈炯明在漳州所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林森、胡汉民、汪精卫、居正、吴稚晖等名流都先后造访漳州。闽南护法区的巨大成功和陈炯明的社会主义倾向,不仅赢得了国内舆论很高的评价,还引起了英美国家和苏俄政府的关注。

1920年4月下旬,在中国的原沙皇海军少将波塔波夫肩负苏俄的使命会晤孙中山之后,经孙中山介绍赴漳州访问。波氏和随员一行共六人,由“社会主义者同盟”华北区代表黄超海陪同,从上海乘轮到厦门,然后转乘小船抵漳州。波氏带来列宁给陈炯明的亲笔信及亲笔题名的照片。在信中,列宁对中国革命表示深切的关怀,对陈炯明的行动表示敬佩和鼓励。在谈话中,波氏希望陈炯明注意发动群众,多做农民运动。并承诺,如果漳州需要,可以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提供给粤军使用。陈炯明对列宁派代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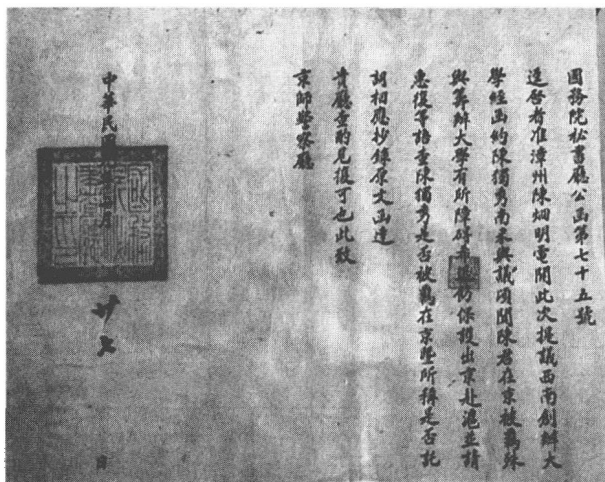
来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在5月8日给列宁的复信中,陈炯明明确地指出:“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只有消灭国界,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考虑实现人类的平等。”这封信由朱执信起英文稿,廖仲恺打字,曾于1921年3月刊载于苏俄的《外交部公报》中,编者按语中称陈炯明为“受过良好军事教育之中国最杰出军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称漳州为“中国革命党的摇篮”,中国的“精英革命分子”趋之若鹜的地方。<sup>①</sup>

就是在这—时期,陈炯明与刚到上海不久的陈独秀建立了通信联系,并邀请陈独秀到漳州主持教育工作。

早在1920年2月17日,为邀集国内教育界人士筹建西南大学,陈炯明曾经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切实保护陈君(独秀)赴沪,以便借重筹议”。这说明陈炯明是十分看重陈独秀的。在此前后,二陈已经互通书信。据张国焘回忆:“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

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办。”

陈炯明为开辟闽南工作的新局面,引进了大批新派人物。他不但将朱执信这些人作为他的重要助手,而且将他在广州晦鸣学社时的“旧人”梁冰弦、刘石心等人也招至漳州工作。梁冰弦是无政府主义的活跃人物,他到漳州使陈炯明与陈独秀的关系更往前进了一步。



陈炯明请陈独秀筹办西南大学,要求北京政府切实保护陈独秀赴沪。这是北京政府国务院给警察厅的询问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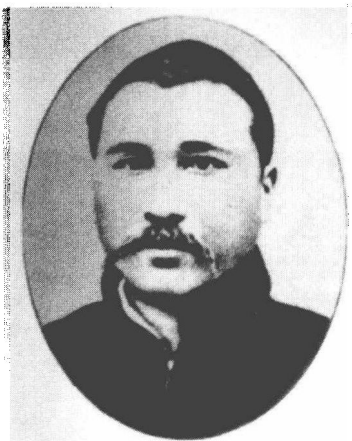
因为陈独秀参与领导的由俄国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松散团体“社会主义者同盟”与梁冰弦等人在广州成立的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有着经常性的联系。

接到陈炯明的邀请之后,梁冰弦、刘石心等与一批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及排印技工,带着一堆印刷器材到了漳州。他们在漳州创办《闽星报》和《闽星》半周刊,陈炯明亲自为《闽星》写了充满激情的发刊词。陈炯明对教育方面也相当重视。梁冰弦向陈炯明提出建议,增设闽南护法区教育局,以司教育行政,使教育局与财政局、工务局并列,直辖于总部。朱执信赞同其议,陈炯明即据以实施,并要梁冰弦任局长。而梁氏却主张请“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起者陈独秀来承担这一职务,并随之去信上海向陈独秀发出

<sup>①</sup> 参见黄岭峻《陈炯明与中共关系考——兼与台湾学者吴相湘先生商榷》,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6期。

了相关邀请。陈独秀当时急于考虑的主要是创党的问题,因此婉言拒绝。尽管陈独秀这时未能应邀入闽,但二陈之间在对社会主义问题“研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经过“社会主义者同盟”盟员促进的交往,显然非同于一般的泛泛之交。它是二陈关系进一步密切的基础,是陈独秀后来入粤任职的先声。

陈炯明主政广东之后,在广东教育主管缺位的情况下,再次接受梁冰弦的建议,诚恳邀请陈独秀南下主管广东教育,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今省教育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sup>①</sup>



广东省省长陈炯明



陈炯明出席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开幕式

陈独秀接到邀请信后,跟李大钊商量是否应聘去广州。李大钊认为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思潮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陈独秀也认为广东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很想借此机会在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工作,因而对广东寄予较大的希望。为了确保能够在广东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的三项条件:

- (一) 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 (二) 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
- (三) 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

12月11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无论如何,决不短发”。

得到这样的保证,陈独秀决定接受邀请,南下广州。临行前,陈独秀安排好上海方面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由陈望道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1920年12月17日晨,陈独秀登上开赴广州的轮船。

<sup>①</sup> 参见曾庆榴《陈独秀与陈炯明关系考释》,载《粤海风》2010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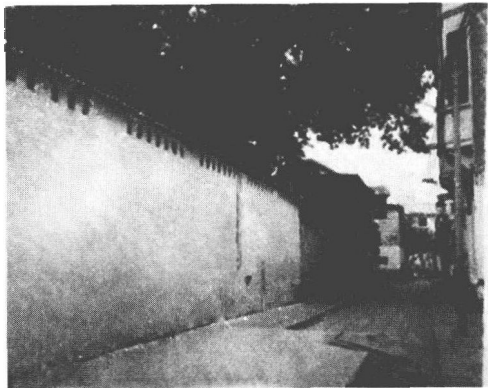
#### 4. 有职有权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12月25日,陈独秀抵达广州,先是被安顿在大东酒店,不久即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坐在书桌前,就可望见窗外的白云山,陈独秀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看云楼”。

就在陈独秀到达广州不久,维经斯基与柏列维一起也来到广州。他是奉远东共和国驻北京政府外交使团团团长优林之命前去拜访陈炯明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这位被苏俄称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著名将军真正的思想动向。维经斯基对陈炯明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早就想“就近仔细观察他‘神奇的’空想和计划”。



老广州街道



广州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陈独秀在广州的住处看云楼就在这条巷子的11号

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柏列维一起去拜访了陈炯明。维经斯基回忆说:

陈炯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位将领,他早年是新闻记者,是秘密组织成员和国民党员。陈炯明给人的印象是意志坚强,很能自我控制。就其谈吐和举止看,他是一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是认为孙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sup>①</sup>

陈独秀这次在广州居留的十个月,实际上是在陈炯明的政府里做官。这是二陈近距离接触,也是他们相互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阶段。

1921年元旦,《广东群报》出版增刊,刊出陈独秀的照片,标明是“已到广州之陈独秀先生”。增刊的头条位置是陈独秀的文章《欢迎新军人》,配以列宁的大幅照片,令人耳目一新。这篇文章大意是说:军人危害社会,招致人民的厌恶。“救济的方法,既不能从根本上废兵,唯希望一班新军人挺身而出团结同志,将一班危害社会的旧军人渐次淘汰

<sup>①</sup> 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载《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页。

干净。”新、旧军人根本上绝对不同的是两条：一是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二是做有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消费的军人。陈独秀说：“我希望我广东的新军人随着新年思想一新，实行新军人的两大信条，宣传新军人的两大信条，好做全中华民国的新军人的模范。我心中对于广东充满了我的希望，我更希望广东军人能为中国军界开一新纪元。”

《欢迎新军人》是初到广州的陈独秀的“亮相”之作，是一篇寓意深长的新年祝词，更是写给陈炯明这些人读的。



初到广州的陈独秀

尽管在政治上仍存有争议，但在私生活及操守方面，陈炯明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军阀作风完全不同。他不仅颇有文采，而且廉洁自持，不蓄私财，在生活方面也相当严谨。陈炯明此次主政广东，是很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他虽然信奉无政府主义世界大同的终极理想，但并不赞同刘师复“不作官吏军人议员”的信条，主张通过掌握军政大权、力行革命和建设来实现这一理想，把自己的大同理想与现代化进程相联系。

“联省自治”一直是陈炯明坚持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广土众民，只能实行分权自治，才可养成“民治精神”，建设民主。陈炯明一到广州，就欢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由沪回粤，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以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的初步计划。这个初步计划分两方面并进而行：一方面制定省宪，同时实施地方自治，建设广东为模范省，以“模范起信”来号召国人的注意。

当时广东受战祸蹂躏已十多年，实行地方自治，建设广东为模范省，与广东人休养生息的渴望正相吻合，因此得到粤人的热烈支持。



广州街头大张旗鼓禁赌情景

广东的模范省建设计划，包括改革教育，设立现代化市政府，设立特别市等重大举措，具体措施包括司法独立、整顿财政、禁烟禁赌、裁兵减政、实业交通、革新警政等。其中最见成效的是严禁烟赌。

从作为议员提出禁赌议案时起，陈炯明就把禁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赌博的恶习由来已久，但政府历来把赌税当做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